

新集體主義與 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王穎

在人民公社解體和市場經濟越來越發達的今天，集體經濟能否繼續生存發展？市場經濟是否必然導致全面私有化和資本主義？以私有化為基礎的「西方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的唯一模式和唯一出路嗎？中國能否在市場經濟中，不盲目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的市場經濟，根據自己的國情走出一條「制度創新」道路？羅伯特·昂格(Roberto Unger)和崔之元文章討論的問題，正是中國社會學界和經濟學界普遍關注的。

根據近年的實證研究，我們認為，中國社會在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並沒有像前蘇聯、東歐國家那樣走西方社會全面私有化道路，而是依據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與人民公社的現實，結合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傳統，對已有的體制、組織結構進行有選擇的揚棄，一切從實際出發，走出了一條最適合中國國情的、以新集體主義為特徵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本文將主要以廣東省南海市的實證研究為依據，並參考其他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經驗，展開論述。

新集體主義並不單純是一種意識或所有制形式，而是中國所獨有的社會經濟組織方式，它區別西方以個人為基本單元的社會組織模式。

一 新集體主義與新集體組織方式

新集體主義並不單純是一種意識或所有制形式，而是中國所獨有的社會經濟組織方式，它區別西方以個人為基本單元的社會組織模式。新集體主義包含了一系列重新界定了的概念，其中有兩個需要作出特別的解釋：一個是集體，一個是社區。

所謂集體，是指從人民公社時期延續下來、以土地關係為紐帶而結成的農民利益群體。所謂社區，是指一定地域範圍(多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界線)內的農民利益群體，以集體的形式而結成的社會實體。事實上，集體與社區可以合併為一個概念，即：集體社區。它是與中國以公有制為基礎形成的城市社會截

然不同的一種社會制度和組織結構，是新集體主義生存的客觀載體。

新集體組織方式，有兩個基本的含意。首先，它是針對西方社會以個人為基本單位、以法律為聯結紐帶的社會經濟組織方式而言的。在中國鄉村，隨着鄉村工業的發展，集體社區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南海為例，村集體通過「總廠」或「總公司」的形式，將分散的個體農民組織起來。在農業上提供五統一服務（機耕、排灌、育秧、植保、布局），實現了個體承包與集體提供社會化服務的雙重經營。在工業上，以集體提供「五通一平」（通：水、電、交通、通訊、排污設施，平整土地）的工業小區，使分散的各類企業相對集中，發揮規模效益。同時利用集體與政府的關係，為個體私營企業提供各種服務。通過集體企業的實力和集體的資源優勢，使個體私營企業越發展，對集體和政府的依賴程度越高。在發達地區，集體社區已經成為地方經濟的最基本的組織單位。

第二，新集體組織方式是指在市場經濟的建立、發展過程中，以集體企業為龍頭、為支柱，帶動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並在發展的更高層次上，通過股份制實現各種所有制企業相互融合的混合型企業，和帶有明顯地域性、行業性的集團式企業，以發揮區域性的整體優勢。如南海西樵鎮在集體生絲生產企業和染整企業帶動下，個體紡織業獲得很大發展，並形成了具有全國性的數一數二的紡織品市場。再如里水鎮以「寶鮮公司」（蔬菜保鮮公司）為龍頭，帶動個體農戶的外向型蔬菜生產基地的形成。從目前情況看，南海市絕大多數私營企業都與集體企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合作關係。比如羅村鎮務莊村的八十多家企業中，其中8家被稱作私營企業，實際掛的是集體的牌照。在這幾個私營企業中，最大規模的企業固定資產在10萬元左右，與最小規模集體企業相當。而集體企業最大規模的資產達八千多萬元，其所有制也已超出了村集體範圍。在全部集體企業中，只有兩家企業是完全的村集體企業，其餘均為各種所有制的混合型企業。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集體組織方式中，地方政府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是將各種生產要素進行最優配置的核心領導者，是市場經濟中最有力量的調控者和組織者。它依靠人民公社遺留下來的三級集體組織，以及自身派生、分化出來的一些「總公司」、「總廠」或行業性協會等經濟組織，將各種經濟力量整合起來。它要在一定地域內，實現最佳資源配置，以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整體優勢。如大瀝鎮鄉鎮企業辦公室，通過組辦有色金屬集團公司，將二百多家個體小冶煉廠集中起來，從1990年開始重點培育有發展前途的鋁型材生產企業。到1992年，已有各類鋁型材企業58家（全部為聯合型企業），產值5億元，並迅速形成全國性的鋁型材市場，市場銷售量約佔全國銷量的四分之一。

二 新集體主義產生的社會基礎

首先，中國的改革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的，是興利除弊變革，而非徹

土地歸集體所有的制度，一方面使個體農民與現實的集體存在着一種因土地關係而自然建立起來的利益關係；另一方面則從根本上排除了全面私有化的可能性。

底革命。因此，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在這個制度下形成的集體觀念必然會作為一種文化的澱積而留存下來，直接對正在形成的市場和經濟運行模式產生重要的影響。

第二，公社解體後，農村所直接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受到計劃體制保護的、建立在城市社會的工業體系。剛剛擺脫了公社制度的農民要發展二三產業，就需要大量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經營管理經驗、信息和業務網絡，而這些對於個體農民來說簡直是不可能的。與個體農民相比，集體佔了顯著優勢。集體可以在本地區範圍內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集中分散的資金，匯集各類人才，利用各種關係建立購銷、信息網絡，在集體所擁有的土地上迅速發展起現代化的工業企業。

第三，土地歸集體所有的現行制度，是新集體主義生存與發展的客觀基礎。土地歸集體所有，一方面使個體農民與現實的集體存在着一種因土地關係而自然建立起來的利益關係。這種關係隨着集體經濟實力的加強，集體提供給個人福利與保障項目、數額的增多，而不斷增強。另外，土地歸集體所有，從根本上排除了全面私有化的可能性。個體私營企業在發展到一定規模時，要擴大生產規模，就不得不徵用土地，而這在現實制度上是不允許的。因此，絕大多數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都採取了與集體聯營的方式。

第四，幾十年的人民公社體制，已經使集體主義思想和集體意識深入人心。或者說，是個人已經對集體形成了一種依賴。在大多數農民的意識中，集體就是自己的靠山。比如里水鎮的農民，當市場價格高時，他們不願把荷蘭豆賣給「寶鮮公司」，但當市場價格一跌再跌，農民受不了時，他們就想到了政府和集體。他們通過集體，讓政府出面迫使「寶鮮公司」以高於市場的價格收購，以保護當地農民的利益。而作為集體的幹部，同樣把發展集體經濟、減輕農民負擔、提供農民更多的福利作為自己的責任。再看幾十年計劃體制下形成的消費意識，更是對個體私營企業的產品充滿不信任。這些都與幾十年社會主義制度、計劃經濟體制以及長期進行的集體主義思想教育有關。雖然市場經濟強化了個人利益，但集體經濟的發展，又使個體農民對集體產生了新的依賴和新的情感。

第五，產生新集體主義的社會基礎，一個是近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另一個就是幾千年的傳統文化，更確切地說，就是一種泛家族文化。如果說，在小農經濟下，家族文化佔支配地位，那麼，在現代經濟中，超越了血緣、被泛化了的家族文化則成為現實的社會思想基礎。它把家族文化的精髓提取出來，泛化到一切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中，使每一個「集體」或「單位」都像一個大家庭。其內部人與人的關係，除明確的利益關係外，還附加上一種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情關係」。集體社區實際上就是這種泛家族文化的直接產物，它在行為方式及對個體農民負有的責任上，與家族有着驚人的相似。正是在這種泛家族文化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泛家族制度基礎上，才可能形成中國目前存在的，以新集體主義為特徵的市場經濟模式。

產生新集體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一種泛家族文化。它把家族文化的精髓提取出來，泛化到一切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中，使其內部人與人的關係，除明確的利益關係外，還附加上一種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情關係」。

三 新集體主義摒棄了絕對化的「公」與「私」

從南海集體企業與個體私營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我們發現，絕對的「公」與絕對的「私」正伴隨現代企業的興起而逐漸消失。換句話說，絕對的「公」與絕對的「私」在中國都是行不通的。

絕對的「公」使中國經濟瀕臨崩潰，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那麼，絕對的「私」就可以使中國強盛嗎？事實表明，絕對的「私」(全面私有化)也不能救中國。廣東農村流傳着這樣一句話：「發財靠自己，致富靠集體。」在南海許多鄉村，一開始不注重集體經濟的發展，結果，雖然農戶有錢，但生活環境卻得不到改善。這同時又反過來限制了個人的進一步發展。只有在1986年南海重新大力扶持集體經濟以後，南海鄉村工業才逐漸走出了初加工工業和傳統手工業的範疇，開始依靠集體的力氣，改善鄉村的投資環境，向高科技、高投入的現代化大工業方向發展，並從一個落後的農業縣一躍而為全國百強縣評比綜合指標的第二名(1993年)。實踐表明，絕對的「公」與絕對的「私」都不能促進中國經濟的迅速騰飛。只有在充分調動個人積極性的同時，注重發揮集體與個體的兩個積極性，才能產生最佳的社會效果。這恰恰是新集體主義的精髓。

實踐表明，絕對的「公」與絕對的「私」都不能促進中國經濟的迅速騰飛。只有在充分調動個人積極性的同時，注重發揮集體與個體的兩個積極性，才能產生最佳的社會效果。這恰恰是新集體主義的精髓。

南海的經驗說明，新集體主義不同於以往的排斥個人利益努力向公有制躍升的集體主義。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集體首先明確承認並保護個人財產和利益，而且逐漸通過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將過去模糊的集體產權明晰化，形成真正的人人共有。第二，集體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同時又充分利用集體意識和集體力量，將每個微不足道的個人力量聚合起來，在市場競爭中充分發揮合作，在短時間內取得市場優勢，佔領國內市場乃至國際市場。第三，在新集體主義下，越來越多的「公」「私」融合型企業、「公」「私」結合的經營管理方式和多種成分的混合型企業正在興起，並形成一種發展的新趨勢，逐漸取代以往簡單的企業產權形式。而那種絕對的意識形態二分法正在被新集體主義所替代。

如果說，隨着市場經濟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由絕對私有的個人資本向並不完全個人所有的法人資本轉化是一種趨勢，那麼，中國在經歷了四十幾年社會主義公有制後，則是由國有、公有、集體所有向包含了個人資本、集體法人資本在內的混合型經濟方向發展。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根本沒有必要照搬別人的作法，經濟發展的形勢也不允許我們跟在別人後邊亦步亦趨。更何況西方的經驗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以為，中國經濟在中國這種特有的社會結構支持下，在以新集體主義為特徵的社會經濟組織方式下，一定能夠獲得迅速的發展，在二十一世紀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